面向 21 世纪的清史研究

——部分清史专家笔谈

戴　逸　时光飞逝，转瞬进入了新的一千年，面对新世纪，脑子里总萦绕着一个问题：在新的世纪中，清史研究会如何发展？将取得怎样的成绩？

清朝作为全国性政权，存在 268 年之久，国祚绵长，人口众多，版图广大，其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朝代，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前人做了的功业，后人不可抹煞；前人犯过的失误，后人不应重复。268 年清朝历史的经验教训十分丰富、重要，足资训迪，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易代修史”是中国人的传统，“修史”是为了记取先人的成功与失败，以增长后人的智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易代”是因为事过境迁，人们更能够摆脱当前的利害关系和时代成见，以客观平静的心态对待历史，更能有时间从容地收集史料，反复思考，避开干扰，进行总结，探寻规律，吸取教训。清朝修撰《明史》，至乾隆年间正式发行，时距明亡已近百年。民国初修《清史稿》，于民国十六年匆匆成书，其搜集资料、编次撰述、部勒成史，固有不可磨灭之功绩，然时间短促，讹误颇多、立场保守、毁誉失实，多可议之处，故只称《清史稿》。我侪后来者当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加修撰，以竟其功，这是我对新世纪中清史研究的希望。现在距清朝之亡已有九十年，重新修撰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

新中国之第一代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大型清史之修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建议编修两部大型史书，一部是中共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曾请吴晗同志考虑筹划此项工作，吴晗对清史的修撰编纂做了初步设想。适逢国家困难时期，此事暂时搁置。1966 年周总理又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和筹划清史编纂事宜，中宣部专为此事召开部长会议，决定全国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是时已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前夕。突然降临的文革风暴使方欲启动的清史编纂又告流产中止。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发一封关于建议编纂清史的信件，故大型清史之撰写编纂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关心的研究项目。

今天，大型清史之编纂比过去任何时候，条件更加充分，时机更为成熟。

第一，清亡已九十年，当年被视为绝密之政治、军事事件已为世人所习知。故宫及各地原存之档案经过多年整理，已陆续刊印公布，可以公开利用。清朝近三百年之档案数量极大、汗牛充栋，且大多是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中央机关之档案，所记多军国大事，这是撰述高水平清史之重要条件，今天已大体具备。

第二，以前，清史研究未受重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逐渐升温，成学术界关注之热点。大量著作与论文陆续发行，质量较高，史料丰富，论证充分，分析深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专著出版，足资编纂大型清史之参考。

第三，近二十多年，我国学术研究进入正规，发展迅速，各地设有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满学研究等机构，出版了专门的清史定期刊物，培养了许多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博士与硕士。今天，研究清史之人才远远多于建国初期，可以组织起编纂清史的较大的高水平队伍。

第四，近二十年来，在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已做了编撰大型清史的前期准备工作。如完成了《清代人物传稿》、《清史编年》、《清通鉴》以及其他专史专著。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相互协作、群策群力，撰写编纂大型清史已非甚难之事。

我国修史，自唐朝以来均由政府主持此事。官设史馆，聘用人才，以成大业。盖因修史之事重大，内容繁富，工作艰巨，个人绵力，难以胜任。必须由国家倡导鼓舞，组织全国之力量，宽予经费，使得购置图书，聘请英贤之士，优给待遇，以解后顾之忧，俾其悉力从事，心无旁骛，假以时日，严以考成，必能完满成功。我相信：21 世纪之中国必能完成此文化学术之伟业焉。(作者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锺翰　关于清史与满族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跨入 21 世纪之前的最后一年，作为一个从事清史与满族史研究多年的历史工作者，很有一些想要说的话。

清朝是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蒙元祚短，而满清长达近三百年，文治武功，非独汉唐莫敢望及，即较之元朝亦略胜一筹。

展望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的清史满族史研究工作者不但人才辈出，必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的思维方法论方面，同时保持我国史学界自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吸收从欧美传入对我有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以便我们在清史满族史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大的飞跃和新的突破。

拿从事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来说，史料方面，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在中国大陆启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续修四库全书》首先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与《未收四库全书丛编》相继编辑。其中《存目丛书》与《禁毁书丛刊》迄今已先后出版问世。这大大地为我们从事研究南明史与清前期史以及明代女真史与满族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稀资料，必将作出为前人所不及闻见的新发现和新突破。

即可预见的 21 世纪的前 20 年中至迟前 50 年中，不论科技发明创造和经济发展繁荣，必将有一个大的飞越，民富国强，拥有大量的丰富物力和财力，对人文社会科学和对自然科学必将有同样大的投入，使之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和进步。即以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来说，不但能充分利用前人所从未见闻过的禁毁书籍，而且我们还可以申请直接到东西欧的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去查阅明末清初由罗马教皇派遣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或其他文字写回报告教皇的书信集。这样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资料范围不仅仅限制在汉文或本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资料之内，而扩大到跨越国界能亲自利用欧洲中古以来的文献资料了。

以上所述，仅就利用文献资料方面而言，若就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想方法而论，我们固然不能就事论事，或先入为主，或想当然，即轻下断语，甚至人云亦云，辗转贩卖以自欺欺人为能事。殊不知从事研究工作者，必须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搜集资料，具体分析概括，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大量资料（包括地面的和地下的）是首先必须下的一番苦功夫，至少用几个月或几年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或许能形成一种新认识和一种新见解，但仍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算数。即以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例，必须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作为这一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加以条分缕析，一定要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考虑才成。失掉了问题的重要线索，孤立地、从各种偶然性巧合上进行推测，自然会导致各持一词，异说纷纭，永无终止地争论下去，是很难求得大家共识的结论来的。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的疑案问题，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很清楚，绝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而明确无误的史料遗存下来，使人们来判定是非。如果真的有完好无缺的史料保留下来的话，就用不着历史研究工作者来再作考据工作了。因此，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残缺零散、有时甚至互相抵牾，使人扑朔迷离的史料中找出可信的部分史料，得出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考据当然是必备的手段和功夫，但更重要的是指导考据的正确思路。这种思路就是将零星散乱的材料纳入历史事物发展的逻辑中联系起来加以全盘考虑的结果。这种考据实际上已不同于传统的对某一名物制度或某一人物与地理方位的孤立考证，而是从孤立、矛盾的记载中发掘演绎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来解释各种表面现象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和结果。

再说清史与满族史的研究关系问题，两者本为一体，内部联系极为密切，但究竟断代史与民

族史各有不同之处，融会贯通，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尤非一朝夕之功。然对满族史的理解和研究，应该是研究清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对满族的形成、发展以及独特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生活的深入钻研，就难以把握清朝统治的特性，难以探讨有清一代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底蕴。反之亦然，不懂得清朝一代的行政措施和地方建置，亦无法进入深究满族史的大门。举例而言，风行一时的《康熙传》、《雍正传》、《乾隆传》三书是清史专著抑或是满族史专著呢？答之曰：从清史角度来写即是清史专著，从满族史角度来写即是满族史专著。

末了我想提一下，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首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自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心向往之，而力不从心，但今天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专家学人自然能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二、充分掌握中外通史的基础知识，对本国史固不可数典忘祖，亦不宜轻视外国史为不足学，希腊、罗马之史固要学，即欧、美历史亦不可忽视不读，不学希腊、罗马的历史，又怎么能了解欧美今天文明之所从来？三、多学语言文字，越多越好。我们今天虽不能做到像已故的一代大师陈寅恪教授那样能通二十来种语文，但作为21世纪的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除本国母语熟练精通，能写出好文章外，必须至少学会三种语文，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之外，还必须学会一种少数民族语文（与所学某一少数民族有关)，这对学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与满族史的研究工作者特别重要，是缺一不可的。（作者王锺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李文海　20世纪是清代历史作为一个学科诞生、成长并初步走向繁荣的时期。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史作为一门断代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首先得归功于史学界的一些学术前辈，在这块原本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披荆斩棘、荜路蓝缕的辛勤劳作，归功于一批立志献身于此的中青年学人在这块园地上潜心埋首、无怨无悔的继续耕耘。但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原因，还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使它成为由古及今的一座历史桥梁。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多自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社会需要是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清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既然如此，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清史研究应当在以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争取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新的进步，新的繁荣，一句话，要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要实现这个目标，提倡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思维，增强创新能力，是关键的一个环节。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科学事业本质上是个创新的事业，因为学术研究的任务不是对已知事物认识的简单复述，而是对未知事物的勇敢探索。如果一味陈陈相因，只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了无新意，那也就不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前进。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强调要“说新话”的意义所在。历史由于研究的是已经逝去的岁月，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特别困难，所以恩格斯曾经说，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这样，史学研究就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清史作为一门学科，至今只有80多年时间，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学科而言，还比较年青，因此创新的空间和余地也就较大。就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清代史料，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多，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宝藏，急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就研究领域来说，以往较多地集中于政治制度、人物、事件及经济状况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文

化、民族、宗教、边疆开发、中国与世界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但仍有许多重要的领域较少有人涉足，有的甚至至今仍是一片空白。研究领域的拓展，依然是清史研究创新的主攻方向。前面已经讲到，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即使是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也很难一下子就掌握全部的历史真相，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因此，对于已经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研究基础较好、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也仍然有一个继续深化、不断深化的任务。这种深化，既可以表现为对前人某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研究结论的驳难和纠正，也可以表现为在前人取得的科学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前进，以解开更多的未知之谜。除以上这些外，学术成果发表形式上，在传统的方式之外，如何创造更多生动活泼、为更加广大的读者群所喜闻乐见的体裁和样式，似乎也是学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清史研究领域，汇集了一支素质很好的专业研究队伍。特别是近年来，在一些老专家的培养、带领下，一批朝气蓬勃、踏实苦干的青年学者已崭露头角。没有这样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清史研究的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应该采取更加有力的适当形式，加强这支队伍的组织、协作、交流和团结，以发挥他们在学术创新中的整体功能。

围绕清史研究的创新，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和应该讨论，如：创新与历史观、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学风、创新与学术政策、创新与学术环境，等等。可惜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展开了，这里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大家一起来思考。（作者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龚书铎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朝，也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皇朝。它曾经有过被人们称道的“康乾盛世”，也有道光以后丧权辱国的衰世。有清一代不论正面的和负面的都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清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近 20 年来，清史研究的成绩尤大，成果宏富，不仅有通史性的著作，而且在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诸多领域以及人物研究等也有许多论著问世。其中如清史编年、人物传、清通鉴等大型书籍，为清史研究做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创新、开拓，如果没有开拓、创新，学术只能停滞，以至于衰微。清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没有穷尽，还有不少薄弱或空白的领域，即使已经有很好成果的领域，也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些问题也还有不同见解，需要进一步探讨。这里不可能也无此能力什么都谈到，只是举例而言。

清代学术很有成就，考据学尤为突出，被称为显学。学界对此多所关注，成果为数颇多，但仍有加强研究的必要。考据学自清初兴起，到乾嘉为鼎盛，为研究者所重视。嘉道以后，考据学虽趋于衰落，但仍有一批学者在从事研究，并有著述问世。对此的研究却很薄弱。对于考据发展衍变过程中有关的一些问题，若明若昧，也需要加以弄清楚。例如，嘉道年间汉宋学之争的问题。嘉庆二十三年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问世，为汉学家立传，树汉学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方东树对此不满，于道光六年出版《汉学商兑》，对汉学加以抨击，维护宋学。在一些论著中以此为例来说明嘉道之际出现了汉宋学之争，我在有的文章中也说过同样的意见。不过仔细考察一下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是否发生过一场关于汉宋学的争论，还值得斟酌。汉宋学派之间门户颇深，互相贬抑甚为明显。然而仅以方东树的著作批评汉学、反驳江藩为据，并不足以表明其时形成了一场汉宋学之间的公开论争。此外，如关于乾嘉间考据学兴盛的原因，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对考据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考据学是否存在吴派、皖派之分，考据学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无疑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名著，至今仍然有其价值，尤其是对于有志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人来说，应是必读的入门之书。但无庸讳言，由于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也由于作者自己与书中所及晚清学术分不开，难免会有某些可探讨之处。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梁启超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此说以考证学、今文学为贯穿有清一代学术主脉，条理明晰，很有启发意

义。自庄存与为今文学复兴之启蒙，今文学于晚清影响颇大。不过晚清今文学的成就及影响，以议政超越于学术。龚自珍、魏源被梁启超誉为“今文学之继者”，而其影响在于“引公羊义讥切时政”。遗风所及，“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当然，治今文学者也不尽如是。湖南王闿运治公羊学，于四川成都讲学授徒，传授于弟子廖平。廖平专治今文学，但未及于议政。而以今文学议政显著者，当推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影响及于谭嗣同。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显然是为维新变法找依据和造舆论。梁启超称此二书如“飓风”、“火山喷火”、“大地震”，其意义在于思想解放，在于政治作用。可以说，康有为今文学的影响，今文学因康有为而流播，是因其“以经术作政论”，因其所领导的救亡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学术而言，康有为治今文学多武断、附会。周予同在校注皮锡瑞的《经学通论》所写的序言中说：“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他这段话概括了晚清三位治今文学大家的不同之处，是准确的。然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于龚、魏以后提到与今文学有关的人有康有为、王闿运、廖平、梁启超、陈千秋、谭嗣同六人，没有皮锡瑞。对于王闿运，梁氏认为“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于廖平谓：“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知守今文家法，晚年以张之洞故，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法”；写得多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自己和谭嗣同。严格地说，三人中只有康有为真正治今文学，梁、谭则是受其影响，接受今文学的思想，而非今文学家。梁氏在书中说：“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对于“今文学派”，他自己说是“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而皮锡瑞则是真正治今文学的，且成果不少，《师伏堂丛书》18 种中有关经学的著述就有 13 种，其他已刊著述有关经学的也有 7 种。不写皮锡瑞治今文学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或许是由于皮氏师承不属于康有为一系，故而不提及。晚清学术，今文学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其他方面，考据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都有值得注意之处。而西学的传播和影响，更是需要研究。即如治今文学的康有为，以及谭嗣同等，都接受了西学，“援西入儒”。（作者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支平　　清代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艰辛路程的历史。本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学人对研究清代历史的理论方法构架，以及运用这些理论方法来深入剖析理解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取得了许多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令人鼓舞。现在，我们面临着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如何继往开来，开创一个更具学术整体性的清史研究新局面，无疑是我们在下一世纪所要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

开创一个更具学术整体性的清史研究新局面，我认为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清代历史是本世纪清史研究最重大的建树，同时也将是我们在新世纪研究清代历史所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解说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时，不免存在某些生搬硬套的缺陷。以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例，就有不少值得认真检讨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以王朝的断代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固然应当予以重新审视，然而把清代的历史，在 1840 年间一刀切为中国封建社会（通称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同样给研究清史的学者们带来许多困扰。研究清代上一段即古代史的学者，大多论到鸦片战争便戛然而止，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更有其一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史学理论。这就造成有些论著未能顾及清代历史研究的整体概念，各唱各的调，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历史研究的科学连续性。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它并不能切断中国传统社会与中国近现代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都不能忽视前清以来的历史渊源关系，更不必说中国文化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只有整体地把握这种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关系，才能全面地理解清代历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艰辛历程。

二、清代的历史不仅被人为地切成上下两段，而且还因“学科分类”的导向，往往被分成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的许多专门史。专门史的研究，对于深化清代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和部门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学者在深入研究清代政治史、清代经济史、清代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时候，都极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进行宏观的考察。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也有一部分清代专门史的论著，自成源流、各说各话，较少注意不同专门史之间的联系。例如思想史和文化史，本来是最为相近的两种专门史，但现在的研究状况似乎是互不相干。思想史的论著所讨论的是唯心、唯物的“形而上”，而文化史的学者则大多热衷于“酒文化”、“茶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的讨论。再如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倾向。西方年鉴学派的学者们，曾经批评那种从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经济史研究，“比无用还要糟”。吴承明先生近来多次呼吁：一部经济史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经济史家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整个历史学的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习俗心态、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来考察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吴先生的呼吁，应当引起我们清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三、清代区域史是近二十年来发展较快的一个研究领域，成绩斐然。许多学者选择不同的区域课题，深入发掘资料，进行细部的个案考察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探求各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清代历史的研究空间，而且还因近年来中国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的兴起，往往与区域史的研究相互促动，从而使清代区域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然而在这一派生机的区域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研究孤立化的倾向。一部分清代区域史的论著，把区域研究当作单纯的个案研究，就当地论当地，就个案论个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的题目日益细小琐碎，埋头于“老鼠打洞”，而对于个案与个案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则未能予以综合的考察和科学的归纳。其结果或是以偏概全，或是浮光掠影，没有特点，缺乏学术和理论的深度。因此，坚持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对清代区域历史作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以及不同地区、不同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克服清代区域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某些孤立化的倾向。

承蒙《清史研究》编辑部的厚爱，我大胆陈述以上陋见，作为《清史研究》创刊十周年的献礼，衷心祝贺《清史研究》越办越好。同时也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与广大的清史研究工作者一道，进一步增强清史研究的整体概念，扎扎实实地工作，在 21 世纪取得更多更好的清史研究成果。

(作者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